

錢存訓先生八十榮慶紀念

婦

媒

媿

中國考古史論集

張克和題



正中書局印行

門

弗

令

錢存訓先生八十榮慶紀念

中國苗土文史論集

張克和題





錢存訓先生近影

中國圖書文史論集

前言

抱簡劬書，學究古今之變；懷鉛吮墨，文擅中西之長。爲學者衆矣，臻於斯境者非可多覩。錢存訓教授世代書香，髫齡志學；少通經史之奧，壯遊圖書之林；著書中秘，撰述擬於名山；講學上庠，桃李遍乎天下。同人沾溉之餘，每思圖報，今值先生八秩榮慶，遂有祝壽論文之議，聊表景慕，兼勵向學。

今茲呈獻者，爲文三十三篇，作者三十四衆，輯爲上下兩編。上編多關圖書目錄之探討，下編則爲文史考據之研究。附錄錢氏生平及著述目錄，以博一覽。集中文稿來自歐美諸邦，洎乎海峽兩岸；撰者則皓白中青，以至西人華語；地無畛域東西之分，人無老少華洋之別。論文範圍，上溯遠古，近賅當代；有嚴密之考證，亦有概括之綜述，有史料之運用，亦有科學之實驗，或作中外之比較，或作古今之商榷，或繁引文獻以證辭，或博徵載籍以注詩。弘論創見，各有專精；裒然成帙，漪歟可觀。此固漢學界之多士，亦錢教授之感召也。

同人等承乏斯役，於年前通函徵諸錢教授知交友棣，甫方振臂，響應隨之，不旋踵而積案盈篋矣。今茲因人成事，既覩巨製之斐煌，不禁孺懷之雀躍，爰記錄起，用誌忻忭云爾。

錢存訓先生八十生日祝壽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許倬雲

李歐梵

潘銘榮

鄭炯文

馬泰來

謹識

1990年1月11日

中國圖書文史論集

目 次

上編：印刷、造紙、目錄學

從雕版到活字印刷發展中的幾個問題·····	勞 幹	1
宋代四川印刷的特色·····	潘美月	7
南宋杭州印刷淺談·····	艾思仁	17
中國印刷版權的起源·····	潘銘堯	21
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業·····	盧秀菊	27
泥活字印刷的模擬實驗·····	張秉倫 劉云	57
中國新發現的古代印刷品綜述·····	鄭如斯	63
再論造紙術發明於蔡倫之前·····	潘吉星	73
論蔡倫造紙的前因後果·····	蘇瑩輝	85
近年來考古發現的古代書寫工具·····	陳家仁	91
從幾部書的版本著錄來認識版本鑑定·····	崔建英	101
武英殿四庫全書總目出版問題·····	昌彼得	115
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沈 津	121
圖書資訊學芻論·····	周寧森	133
中文文獻課程對推廣圖書館利用之貢獻·····	黃世雄	145
臺灣地區漢學研究近況·····	王振鵠	153

下編：考古、歷史、文學

中國古代製陶工藝試探·····	浦 爾	177
芝加哥大學所藏商代甲骨·····	夏含夷	197
沈子它殷拓本題記·····	顧廷龍	209
孔子思想與科技·····	程貞一 席澤宗	217
釋同產·····	陶天翼	233
中國與伊斯蘭的子午線實測·····	許倬雲	253
唐代礦冶知識與技術的發展·····	黃盛璋	259
對中世紀中國藥物“秋石”特性的試驗·····	黃興宗	277
安南王朝多爲華裔創建考·····	張秀民	281
關於明清通俗文學和印刷術的幾點看法·····	何谷理	289
試論明末清初東南地區某縣的宗教活動·····	戴 樂	301
李之藻信奉天主教的緣由探考·····	陳明生	313
關索與《三國演義》的版本·····	歐凱妮	321
馮夢龍友朋交遊詩考釋·····	馬泰來	329
由王國維書信集試窺其生平及學業·····	王西艾	337
附錄		
坐擁書城五十年·····	鄭炯文	351
錢存訓教授著述目錄·····	潘銘榮	359
作者簡介·····		371

從雕板到活字印刷發展 中的幾個問題

勞幹

宋代慶歷中（宋仁宗時期，1041-1048），平民畢昇（可能就是一個刻字匠）創造活字印刷，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就當時來說，並不是十分引人注意。這件事除去了沈括的《夢溪筆談》曾經有一段敘述以外，在別的典籍中被完全忽略掉了。因此這件事情的來源去脈始終是混沌著，而其中的困難和問題，自然更不被人詳為道及了。現在宋版書尚有一個相當的數量，可是能指明為宋活字本的，尚待發現。甚至被稱為最簡陋的福建麻沙本也是用雕版而不是用活字印刷。這是因為什麼？就有探討的必要。

印刷術和印章及拓碑有若干的關係，這是不成問題的，而活字的發展，除去和版片印刷有直接的影響以外，對於印章及拓碑也應當還有一些聯繫的。首先談有關印章的事。中國的印章，現在只能溯及周代；商代有無印章，現在尚不能證實。但就黑陶上的圖案來看，有些是用圖案式的印章，一個一個的打上去的，雖然不是作「符信」用，但和後來做符信的印章，構造非常類似，並且後來印章也是用在封泥上，封泥是用黏土製成，也可以和古代的陶土找出多少聯繫。在埃及古代也有印章，不過是一種戒指形的，似乎和中國印章的起源，不容易聯繫得上。

把印章圖案一個一個的排列上去，和活字的設想有若干的相似，只是陶器圖案是重複的，只有一個印章打上，就夠用了。活字卻需要不同的字排列上去，然後才可供給一篇文辭的應用。雖然辦法不是全同，但意念的相關，應當可以找一點線索出來。

當然，黑陶上的印文圖案只能算追溯問題的一個開始。從黑陶到北宋，時間太長了，彼此之間是聯絡不上的。不過從漢代瓦當以及墓磚的製作看來，是使用了木刻的版畫，並且還有各項拼湊情況。這種用版片印造的花磚，在敦煌晚唐或五代洞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從經過漢代唐代，這種印版到黏土作為陶瓦的方法，是可以和北宋接得上的。畢昇用膠泥（即黏土或 clay）來做活字的構想，其出於印版和黏土在應用方面，曾經有這實用的聯繫，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印刷和黏土有相互的關係，不過真正成為印刷的書籍，一定要等待紙替代了木簡或竹簡而成為通用的用品以後，才可以應用得上。紙的通行採用，漢代的技術還不夠，

還應當晚到兩晉之間。從蔡倫發明紙以後，雖然在遠景來說，十分光明，但在應用方面，技術還不夠成熟，並非如同《後漢書》以後代眼光來看，說是很成功的就代替了竹木簡，做了大量的貢獻那樣的樂觀。就現在已經發現和蔡倫同時的紙來看，雖然已經進步到了可以做通信的使用，這只是一個紙的曙光，只算一個初步，就造紙技術來看，那時的紙是粗糙而且不均勻，距離正式的大量使用，還要等待到兩晉之間。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拓印的發展也可以看到紙的應用。依照錢存訓先生《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紀錄》（第55-56頁）說：

拓印起源難以確定。根據傳統的说法，可追溯到公元二世紀，但這個說法是從「摹寫」一辭而來，並不可信。《後漢書·蔡邕傳》：「（熹平石經）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但此處「摹寫」二字，是指以手抄寫，而不是拓印。再者，從石面上或其他堅硬的表面上拓印，只有在製造輕薄的紙的技巧已臻完善之後，方才可能。在中國西北和新疆等處發現的公元二、三世紀的大紙，厚而粗糙，似乎尚不宜於拓印之用。

現存拓印的古本，最早的是公元七世紀之物，但我們相信拓印的技術，應在此以前，《隋書·經籍志》記載隋代皇家圖書館中藏有拓石文字，以「卷」為單位，包括秦始皇東巡會稽的石刻文1卷，熹平石經殘文34卷，曹魏三體石經17卷，並述及梁室所收藏石刻文字，在隋時已散佚。

所以拓石的技術，最早只能推到南朝的梁代。而且隋代的拓本以「卷」為單位，就可以證明隋代拓片取用的紙片是大幅的，可以一卷一卷（即以捲來計的），表示造紙的技術已經有很高超的進展。此外還有一個旁證，即梁代的墓闕，左闕和右闕，字跡細部完全相同，只是一個是正面字，另外一個是反面字。這個反面字不是寫成的，而是在正面字一方已經刻好，然後再施墨拓或印製，做出來的拓片，再用反面貼在石闕面上然後鐫刻，這才可以除去一個正體石刻以外，另外有一個字跡相同的反面石刻。用傳統的「書丹」辦法，是不可能做出全同的反字的，只有在紙充分使用以後，才可以做到。從《隋書·經籍志》隋代已有拓本這件事實，應當也可以證明梁代墓闕文字做法的事實。

以上所說的是梁代石闕的反字，是用墨拓方法或刷印方法，把紙反過來貼到石面上再行鐫刻。這是因為隋代已有墨拓，梁代距隋代不遠，可以用墨拓入石的可能性很大。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如其刻石需要反字，不必用墨拓方法這樣費事，只要將碑面刷墨，用紙一印，立刻就可以出現反字。現在從石闕上的反字來證明，更顯出不是印刷從拓墨轉變而來，反而是拓墨從印刷轉變而來。不論怎樣，唐代應為印刷雕版的發展時期，而印刷術又和拓墨有相互影響也是不容否定的。只是照文獻記載以及遺物留存，都已到了唐代晚期，並且在技術上已經達到非常成熟的標準了。

從此以後，拓石和印刷就這樣的平行發展下去。就中紙的發明和技術的進展，是

一個關鍵事項。有了精細而堅韌的紙，才可以勝任印刷和拓石的雙重任務，所以這兩種不同的發明，實際上就是一種發明的兩面，而在反文的墓闕上就提示出來一個重要的線索。

從各方面看來，唐代的初期應當已到印刷開始的時代，精製紙的應用，碑拓的應用，印章的應用（唐代官印爲了印在紙上，就比漢印大了許多），木刻模型的應用，再加上反字的實驗在梁朝的時候早已做過，印刷的契機應當早已成熟，只是唐代初期的印件一直未曾發現，但是我們不可以就認爲沒有。因爲晚唐五代版刻那樣精純的技術，不可能是一個短短的期限所能產生的。印刷的開始應當和宗教的宣傳有多少關係。敦煌發現五代曹氏所印的「毘沙門天王像」單張就是一個代表。相傳玄奘曾散發過佛像單張，此事雖然解釋不同，但依照時代順序，及印刷一般狀況，仍然屬於非常可能的。

印刷的起源既然屬於宗教性的單張，中國的版刻，一直到了宋代的中葉（仁宗時代）都是一塊一塊的木版而非活字的。就現代的看法來說，畢昇的創製活字，誠爲世界印刷史上一件大事。若就當時社會中的便利及當時經濟情形來說，版刻或活字就各有其利弊，並非活字在各方面都是經濟的。畢昇創製了活字，活字還是不十分通行，而宋元以來在印刷方面仍是版刻的天下。但是傳到朝鮮，活字印刷卻盛行起來。明代也就有安氏及華氏對於活字有了相當的貢獻。這種情形一直到了清代，康熙及乾隆以帝王之力，大力支持，不計盈虧，才完成了銅活字的《古今圖書集成》與木活字的《聚珍版叢書》。而民間大量的印刷仍然是使用版刻的。其中只有紙墨簡陋的「邸鈔」（即宮門鈔），是用木活字的，因爲邸鈔要爭時間，而且不需要再版的。這種情形一直要等到鉛印機使用後才有所改變。

凡是任何一種新的發明，在開始創造時，一定有許多缺點要經過了許多次的改革及修正，然後才能夠合於應用。依照《夢溪筆談》所記畢昇開始創造的活字，就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辦法。和我們看到的木活字（在鉛字未使用以前的木造活字），就是全然不可理解的一種設計。

這是在我記憶中的事。我的祖父（名啓恂）當清末光緒年間在陝西鄜州做知州，計畫刻高祖（祖父的祖父，名崇光，曾任兩廣和雲貴總督）的奏稿。原來奏稿在湖南別的房子保存，我的祖父準備設法運到陝西付印。當時找刻字匠刻了一大箱活字，不料運寄奏稿事起了變化，以至被擱置。這批活字印了一部《鄜州志》和一小本高祖的《奉使越南詩稿》（此詩稿印本曾到徐世昌手中，在他的《清詩滙》就取入這詩稿的一部分）。後來這批木活字一直放在我們家裏直到民國十年，我們離開西安，木活字存到別人家，就慢慢的遺失了。不過我還記得這種木活字和現在鉛字還是非常相像，只是大些、長些。和畢昇的活字完全不一樣。當然木活字還是古老式的，並非抄襲鉛字。我看印出來的字形和《聚珍版叢書》還相類似，也許清代的活字彼此還是有相互的影響，地區

的分別並不大。

這是可以斷定的，在畢昇以前，從無活字的設計（黑陶用印章做圖案，還不是活字），所以他的辦法是一個草創的辦法。他的想法，是版歸版，字歸字，字是安裝上去的，版卻不動。這和後來活字的辦法，就用活字拼成一個版，是比較原始些。他用膠泥（黏土）而不用木塊，是因為在未燒以前膠泥更容易鐫刻，既燒以後，更耐磨而持久。問題是在膠泥燒過以後，若有變形，無法修理（銅活字反而可以修理，木活字更不用說。），而且活字排版，總可能不夠用，要隨時補充，膠泥燒製的活字，隨時補充十分不便。照著印刷經驗做下去，從薄片變為長條，從陶製變為木製，都是必然的演進。近代形的木活字應當在南宋時代已經使用，然後再傳到朝鮮（銅活字可能是朝鮮創製的，宮門鈔式的木活字，應當是從元明以來相沿的傳統，與朝鮮的傳播沒有關係）。所以南宋時代傳下來的書籍，一定有活字印出來的，只是不一定能認出來。

就一般情形來說，大部書籍都是刻版的，譬如中央研究院所藏的北宋刊南宋補刊的《史記正義》，就是一部長期存留著，並因屢次再版以致版面破損，再行修補的一部典籍。這部在南宋時期用北宋舊版重印的史書，就印刷史的眼光來看，比北宋時代初印的原本，更有意義。因為(1)這部《史記》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刻印，一般推測，可能是在開封刻印的，不過從南宋時代還在印行一件事來看，這部書應當是在南方刻版的，如其在北方刻版，不可能到了南宋時期，還能應用。(2)因這部書印壞了又重補，經過一個漫長的年代，可見重要書籍是可以重印許多次的，因而最重要的書刊，留下了版刻比較經濟。若用活字，就會印一次，拆一次，不如把書版留下，反而合算的。（這是就古代木刻的情形來說，至於鉛字，因為有紙版，而且還可用照相製版，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印刷術的發明，是從版片開始的，所有木刻印刷，一直到鉛字代替後為止，都是以版片為主的。活字發明，在印刷史上是一件大事，但在中國還是以版片印刷占了主要地位。從畢昇以後，活字印刷應當一系相承，不曾斷絕，但也只占了一個輔助的地位。是否採用活字，在主持印刷的人看來，大概以再版的機會大小來做決定。朝鮮的大量採用活字，可能考慮到當地的市場，一次印行，不必再版，還是活字合算。明代的安氏和華氏，可能在明代晚期的風氣是要多出書，並不十分考慮再版，這就活字很用得著。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以帝王之力，編列《古今圖書集成》，這是佛藏和道藏以外，刊行了的第一部大書。（《永樂大典》雖大，可是不曾刊行，以後就失散了。

《古今圖書集成》有這一次刊行就保存下去，然後清末圖書集成公司才能排印再版，民國中華書局又照原刊影印。）至於《聚珍版叢書》也是為了保存《永樂大典》的殘本，做一次發行的。這也都是不準備再版的例子。所以宋以來的活字，大致也只有比較小型的書，不曾有大部的典籍，因此縱有活字印本傳下來，也不容易辨別出來的。

關於活字版的問題，明代祝允明在弘治時期曾為無錫華氏用銅活字印的陸游《渭南文集》（見《四部叢刊》影印本）作後序，說：

初，光祿懸車鄉社，年逾七十而好學過於弁髦，購書典帙，富若山廩。又製活字版，擇其切於學者，亟繕印以利衆。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夢溪談述活板法，近時三吳好事者盛爲之。然所印有當否，則其益有淺深。惟光祿心行高古，動以益人爲志。（光祿指華燧，言燧曾在光祿寺服務過）。

在這一段中顯示著幾個重要的啓示。第一，爲什麼不用刻板而用活字？答案是「所以易成也」，就是說如用活字，可以省時間，省費用，可以多印幾部書，也就是更可以達到流通書籍的目的（當然古代沒有「紙版」的辦法，所以不能再版）。第二，當著明代中期，在江南印書的人不少，也大都是採用活字辦法。這也就是明板活字書籍之中，除去華氏以及安氏以外，還有若干不甚知名的活版印書家，當然這些大都是木活字印刷，不完全是銅活字。這些木刻活字，是沿襲宋元以來舊法的。只可惜宋元活字書籍傳世的罕見，現今已無法比較了。

宋代四川印刷的特色

潘美月

四川的刻書事業從唐代印刷術發明以後就非常興盛。現存唐人文獻中，最早談及雕版印刷而有年月可考的，是朝廷禁止印行曆日的詔令。《舊唐書·文宗本紀》云：

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板。

這道詔令是唐文宗於太和九年（八三五）依據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之奏請而頒佈的。

《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馮宿「請禁印時憲書疏」云：

準勅禁斷印曆日板。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這是記述四川刻書的最早資料。此外，根據日人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卷上的記載，四川刊印的《唐韻》五卷及《玉篇》三十卷，在咸通時代已經流傳到海外，則當時四川刻書之盛亦可想見。我想四川縱使不是印刷術的發源地，至少是唐代刻書業的中心。因為唐代自安祿山之亂以後，黃河流域爭戰連年，殘破不堪，生產力因而衰微。四川地區較為安寧富裕，人口叢集，文化水準較高，刻印書籍，條件俱備，刻書之事，應運而生，也是自然之理。唐末，黃巢作亂，中和元年（八八一）僖宗避難到四川，成都成為當時政治經濟中心，柳玭隨着僖宗逃至成都，當時成都書肆在蓉城之東南。《舊五代史·唐明宗紀》注引柳玭《家訓》序云：

中和三年（八八三）癸卯夏，鑒與在蜀之二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

據柳玭所言，足見當時成都刻書之盛，雕印範圍之廣。五代後唐宰相馮道雕印九經，就是受四川刻書的影響。

五代時期，內亂綿延，中原屢次的改朝易代，五十餘年間換了五個朝代。唯遠處西陲的四川，獨保安寧，物阜民豐，文物稱盛，故當時成都成為西南文化的重心。而四川的雕版印刷所以能迅速發展，則歸功於蜀相母昭裔的提倡刻書。《十國春秋·母昭裔傳》云：

蜀中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黌舍，且請後主（後蜀孟昶）鑄板，

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孫達古、勾中正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鑄板行之。

母氏刻書可以說為兩宋四川刻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以，宋太祖在乾德三年（九六五）平定四川後，四川刻書遂與汴梁合而為一。母昭裔在四川刊印圖書多年，且以刊行士人易於獲得之書籍為己任。宋平定四川時母氏雖已年老退隱，朝廷仍加以榮寵，詔徵入京，並且將他在四川雕印的書版運往汴梁，繼續刊行，所以北宋初年，四川刻印的書籍傳佈全國。四川因為承平日久，具備種種刻書條件，所以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又命高品、張從信往成都雕造大藏經板，這是宋代第一部中央政府雕印的書籍。如此浩大的雕印工作，全由成都工人擔任，亦可看出北宋初年四川刻書之盛。南宋時代，眉山的刻書事業在成都的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到南宋中葉，四川刻書事業的中心已經由成都逐漸轉移到眉山。當時眉山刻了不少唐宋詩文集、總集，如《唐六家集》、《三蘇文集》、《山谷後山詩注》、《淮海先生閒居集》、《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等。宋代四川刊印的經史子集，很受當時藏書家的重視。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附音本」，「蜀注疏本」。尤袤《遂初堂書目》有「川本史記」，「川本前漢書」，「川本後漢書」，「川本三國志」，「川本晉書」，「川本小字舊唐書」，「川本大字舊唐書」，「川本小字通鑑」，「川本大字通鑑」。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有南宋「眉山刻七史」。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談及蜀本之處甚多，特別是蜀刻《唐六家文集》。從這些藏書志裏，可以看出兩宋時代四川刻書及四川刻本流傳之廣。宋末，元兵入侵，成都眉山及四川其他地區，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四川所刻書版，大都毀於兵燹，所以四川雕印的圖書傳世甚少。本文僅據現存的四川刻本以及一些零散的資料，從字體、紙張墨色、刻工、校勘方面說明兩宋時代四川印刷的特色，並就傳世蜀刻本在研究古籍上的價值，做一嘗試性的探討。

一、字體

宋代刻書的字體，大多模仿唐代的歐、柳、褚、顏諸家。由於各地所宗的書家不同，又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特色。如兩浙崇歐，福建學柳，四川崇顏。歐體方正規整，柳體筆勢剛勁，顏體古樸厚重。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云：「北宋蜀刻經史及官刻監本諸書，其字皆顏、柳體。」
 ①傅增湘謂蜀刻本「字體古勁」②《圖書板本學要略·鑑別篇》謂「蜀刻字體，在顏柳之間，而橫畫落筆處，間有瘦金氣習。」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云：「成都眉山雕版字體略扁，撇捺適長。其大字本，字大如錢，墨色如漆，在南宋雕版中另具疏朗明

快風格。這種川版特徵曾影響長江中游，特別是江陵（今宜昌）、鄂州（今武昌）地區。」

③今附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圖一）南宋刊本《歐陽行周集》（圖二）及《權載之文集》（圖三）、宋孝宗時眉山刊大字本《蘇文忠公文集》（圖四）書影，以見四川刻書字體之特徵。

二、紙張墨色

四川印書用麻紙，因廣都盛產麻紙，唐時已負有盛名。唐代寫經紙均用麻紙，中央政府用紙皆取之廣都。故四川刻書，用紙亦皆取給於廣都。元費著《蜀牋譜》云：

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

又云：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紙，皆以楮皮爲之。……凡公私簿契書券圖籍文牒，皆取給於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區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集，皆以此種傳印。

麻紙薄而韌性強。麻紙之外，也有用藤皮纖維爲主要原料造成的藤紙。麻紙藤紙皆可以耐久，不易磨損脆裂，故保存到今天的蜀刻本，紙張都相當好。就墨色而言，宋版用墨質料精良，色澤較黑，略有光澤，蜀刻本也不例外。如《中國版刻圖錄》圖版二二一《春秋經傳集解》條云：「此本疑卽《九經三傳沿革例》著錄之『蜀學大字本』。……字大如錢，墨光似漆，蜀本之最精者。」又圖版二四二《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條云：「……因推知此書確是南宋中葉蜀本。紙墨瑩潔，字畫遒勁，與文謙註韓文可稱蜀本雙璧。」由此可以窺見一斑。

三、刻工

刻工是刻書必先具備的條件之一，書籍刊刻之工拙，與刻工之多寡優劣有密切的關係。根據《佛祖統紀》卷四十三的記載，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命高品、張從信往益州（今成都）開始雕印全部漢文《大藏經》，歷十三年，迄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始告竣。據《開元釋教錄》之記載，此一《大藏經》共計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如此鉅大之雕印工作，全由成都工人擔任，亦可見當時四川所擁有刻工之多。而開寶《大藏經》刊刻之精美，亦可證明四川所擁有的刻工技術是相當精

良的。《古文舊書考》著錄南宋寧宗慶元間成都府學刻本《太平御覽》一千卷，具有姓名的刻工有一百四十多人，可見盛況。

四、校勘

兩宋時代，四川因為承平日久，文物豐盛，古書多存善本，因此，四川刻印的書籍，往往最接近古本，可以保留古書的真面目，也可以校正宋以後刻本的謬誤。四川刻書，校勘精審，每刻一書均經過多次校勘，故錯字較少。明萬曆以後，刻書者往往校勘不精，譌文誤字，比比皆是。明人刻書又喜妄改書名及刪節內容。傳世蜀刻本正可以校正明刻本之許多錯誤，使古書恢復原來面目，此乃蜀刻本在學術上之價值與貢獻。今舉例說明之：

（一）〈南華真經〉十卷

南宋孝宗時蜀中刻本，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五字，注雙行，行三十字。蜀刻《南華真經》傳世僅此一本，現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王師叔岷先生曾據《續古逸叢書》影宋刊本（卷一至六南宋本，卷七至十北宋本）詳加比勘，撰「南宋蜀本南華真經校記」④謂蜀刻本卷七以下，即「達生篇」以下，大都與北宋本合。《續古逸叢書》前六卷乃影印南宋閩刻本，與蜀刻本則甚多不同之處，王師謂：「昔年岷撰《莊子校釋》，惜未見此本。今此校記，可以補校釋之未備，誠快事也。」⑤足見蜀刻校勘之精審。

傅增湘跋語云：

余取世德堂本十卷，對勘改訂至數十字……皆與涵芬樓之北宋本合，是雖刊於南渡，而其源仍出北宋善本，較閩中刻本及纂圖互注坊本，大有霄壤之判矣。⑥

則蜀刻本可以更正傳世刻本的種種謬誤。現今流傳之《莊子》「天運篇」均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而蜀本無此三十五字，傅氏疑此七句必註語之誤入經文者。傅氏跋語云：

近見敦煌石室唐人寫本「天運篇」正無此三十五字，始知古來卷子本相傳無是，為之忻快無量，於是旁搜博考於道藏本，又得數證焉。檢正統《道藏》貞字號《南華正經》無注本，惡字號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皆無此三十五字，是蜀刻源於古本，足以據依審矣。……偶閱唐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其「天運篇」中此三十五字宛然在焉。是此文乃成氏疏中語，故北宋時如王雱《新傳》尚遵古本，未經攙雜，至南渡展轉刻傳，遂舉此註混入正文。

⑦

蜀刻源於古本，由此可證。則蜀刻本《南華真經》在校勘上之價值，自不待言。研究

莊子者，不可不讀此本。

(二)〈冊府元龜〉一千卷

北宋蜀刻小字本《冊府元龜》，校勘精審，可以校正明清以來各本之謬誤。陸心源曾以所藏北宋蜀刻本校明季李如京本，謂其「舛譌幾不可讀」。各卷脫字比比皆是，僅四百七十一卷中，脫文已一萬三千餘字，顛倒改竄者三卷，至於一句一字之脫，無卷不有，魯魚亥豕之譌，無頁不有。陸氏又藏有舊抄本一千卷，卷首題曰「監本新刊冊府元龜」，陸氏以蜀刻本校之，卷五百九十三末葉缺，卷五百二十顛倒，卷七百三十缺文與今本同，陸氏謂「當從南宋本影寫，則是書在南宋已鮮善本，此本雖殘，殊可貴也。」⑧

傅增湘以卷四百八十三，全卷二十四頁，校李本，改定兩百一十五字。舉其要者言之，如「邦計」總序：「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賄」不誤「貨」。「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供」不誤「貢」。「以周知入出百物」，「知」不誤「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家人田萊之數」，「里」不誤「旅」，「萊」不誤「菜」。……此下選任、材略、褒寵三門，刊正尤繁，不及縷舉。⑨

案陸氏所言李如京，傅氏所言閩本、李本，均指明崇禎十五年黃國琦刻本。黃本脫文誤字甚多，可據此北宋蜀刻本補正，惜未能得見宋刻全書復出一一校正。

趙萬里「館藏善本提要·《冊府元龜》殘本七卷」亦云：「此數卷以康熙壬子五銍堂校之，其佳處殆不可指數。」⑩

以上所舉數例，均可說明北宋蜀刻小字本《冊府元龜》在校勘上的價值。

(三)唐人文集

傳世蜀刻唐人文集有兩系統，一為十一行二十字本，約刻於南北宋之際，今存駱賓王、李太白、王摩詰三集。這個系統的蜀刻唐人集，均為現存最古刻本，最能保留原書之面目，亦可校正宋以後刻本之謬誤。一為十二行二十一字本，約刻於南宋中葉，刻印俱佳，校勘精審，可以更正明正德本及毛晉汲古閣本之謬誤。

清陸心源《儀顧堂集》卷二十「北宋本〈李太白文集〉跋」云：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即吳門廖武子刊本所從出也。廖本摹刊精工，幾欲亂真，愚竊謂行款避諱及刊工姓名既一一摹刊宋本，即有誤處亦宜仍之，別為考異註於下，廖本改易既多，謬誤亦不少，且有不照宋本摹刊者。

《中國版刻圖錄》「宋刻本〈新刊元微之文集〉跋」云：

此書明嘉靖三十一年蘇州董氏刻本較通行，董本遇所據底本模糊處，多以己意揣摹填補。此本可正董本誤處甚多。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九「宋刊殘本《姚少監詩集》跋」云：